

# 陳衡哲《西洋史》內容與其 關懷——附論：當陳衡哲遇上 95 課綱

莊德仁<sup>\*</sup>

本篇論文主要想透過一場相隔七十年之久的兩位高中世界史教科書教授的虛擬對話，來討論長久以來台灣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編寫，所反映對己身文化認同與面對未來世局變化的不確定感。本文首先分析陳衡哲重情惜緣性格，與肩任啟蒙教育的使命感，和其造命的人生觀，再進而從歷史課綱與新史學思潮角度，來分析其《西洋史》一書的典範地位，並從中剖析其反對戰爭與反歐洲中心論的訴求，與注重女性與驅魔意識的特色。最後再從陳衡哲的史學意識，討論其若面對 95 課綱的可能看法。筆者發現：從陳衡哲史學養成歷程與相關學術論著，可知：陳衡哲應是非常喜歡 95 課綱所標榜以核心能力作為教學目標的設計，但對課綱發布所造成歷史學界多年師徒友朋情誼的決裂深感遺憾，且對 95 課綱先教授台灣史的規劃，與標榜強調多元史觀與刻意描述弱勢族群的角度，易讓人產生此是為台灣所設：存在即是合理，小即是美的歷史課綱安排，此雖可凸顯台灣歷史發展地位，但忽略歷史強權的影響力與正面接受所有政權對台的統治，更是突顯 95 課綱迴避台灣在強權競逐下，自我位置的不確定感。

關鍵詞：陳衡哲、95 課綱、反戰、反歐洲中心論、女性意識

---

<sup>\*</sup> 臺北市立建國高中歷史教師、東吳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

## 一、重情惜緣與啟蒙造命

陳衡哲（1891 年—1976 年）是現代中國知名的歷史教授，於 1914 年留美攻讀歷史，並取得碩士學位，回國後曾在北京大學教授西洋史等相關課程。是首屆清華大學庚款留美的學生代表，也是現代中國第一位女教授。<sup>1</sup>所編著的高中歷史教科書《西洋史》，深受市場喜愛，出版後一年已再版六次，當時青年學子紛紛以求得一套為榮。<sup>2</sup>但讓現代台灣青年學子能認識這套歷經一甲子時間之西洋史教科書的部分內容，主要是周樑楷教授的引介，周教授曾引用其部分內容：「紀元前第四世紀中葉，馬其頓忽然出現了一位魔王，叫做菲力布（Philip）。菲力布的唯一目的，是以武力去擴張他的領土。……〔後來〕他被人刺死了。……希臘人聽見這位魔王去世，正欲慶祝他們自由的恢復，卻不料又來了一位更大的魔王。此人即菲力布的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er）。」<sup>3</sup>來與台灣高中生分析歷史著作的史觀內涵。周教授似乎對同樣以西洋史為專業的陳衡哲《西洋史》一書深感興趣，不僅多次談到她作品，且表揚他用女性意識來著作西洋史，是 70 年來少見的優良西洋史教科書著作。<sup>4</sup>

---

<sup>1</sup> 夏志清，〈附錄：小論陳衡哲〉，收入陳衡哲，《小雨點》（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頁 114。

<sup>2</sup> 搶救民間家書項目組委員會，《任鴻雋陳衡哲家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107。還有另外一說是：三年之內印製六版。見陳衡哲，〈六版序〉，《西洋史》（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7），頁 1。

<sup>3</sup> 周樑楷，《世界文化歷史篇，上冊》（臺北：龍騰文化事業公司，2004），頁 13。

<sup>4</sup> 周樑楷，〈歐洲與西方：高中歷史教科書研究分析的基本問題〉，收入張元、周樑楷編，《方法論：歷史意識與歷史教科書的分析編寫國際學術研討會》

陳衡哲不僅是位專業歷史教授，更是現代中國白話文學作家，其民國 6 年的作品〈一日〉，描寫 20 世紀初期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求學的所見所聞及所感，文筆流暢，蘊含思鄉情感，被譽為中國第一篇白話文散文創作。<sup>5</sup>陳衡哲的感性文筆，除表現在其歷史著作外，更展現在其對時人與對時事的關心與評論上，曾多次在報刊媒體上，發表她對中國社會黑暗面與世界局勢發展的看法，她更與當時文壇與學術領袖胡適等人私交甚篤，常常書信往返，內容多次談到彼此對對方著作的意見與欣賞，以及對時局國事的看法。胡適與陳衡哲和她的先生任鴻雋三人從當留學生結緣，氣味相投，感情彌堅，回國後兩家家人亦常常往來，胡適曾引介陳衡哲到北大任教，陳衡哲亦感念胡適的照顧，曾寫詩送給胡適心愛的女兒素斐，詩中充分流露出兩家的深厚情誼與陳衡哲的重情惜緣個性。為讓讀者能更了解陳衡哲女士，茲抄錄內容於下：「素斐，你的父親允許你一首詩，但是他總（會？未？）做給你，我對於你也有希望，所以我送你這首詩。我對於你的希望，是和我女兒一樣，是希望你也做一顆明星，去照引黑暗中摸索的靈魂，使你生死的世界，比了你生前的世界更為美麗光明。我又希望你，將來長大後，來和我的女兒，做一個朋友，你們若是要同渡大洋，去求學異鄉，那我更有一個希望，望你時時的引導她，愛護她，像她的姐姐一樣。我聽說你很聰明，將來自然能與眾不同，你的成就也就無窮。我這一首詩，就算是我的說辭，我祝你身體康強，我祝你智慧無雙，更祝你具一副悲天憫人的心腸，好給這個世界加添些和藹之光。」<sup>6</sup>當時中國正處於現代詩的

---

（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1998），頁 63、67-69。

<sup>5</sup> 陳衡哲，《小雨點》，頁 7

<sup>6</sup> 陳衡哲，〈陳衡哲信〉，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 36 冊（合肥：黃

嘗試階段，陳女士的新詩，雖然內容與形式都如同白話散文，但字裡行間所展現的真摯情感，不僅有著延續兩家兩代情誼的盼望，更流露出民初知識份子鼓吹啟蒙，宣揚西化下，對國家、社會與世界的關心。

這種關心，源自陳衡哲「造命」的人生觀，這與陳衡哲受她舅父鼓勵，選擇走上出國留學這條孤寂辛苦的道路有密切相關。<sup>7</sup> 陳衡哲在她的文學作品中，不斷地宣揚這種價值觀，像在〈運河和揚子江〉中，運河質疑揚子江何苦奮鬥，揚子江說：「我為的是要造命啊！……你不懂得生命的意義，你的命成也由人，毀也由人，我的命卻是無人可毀的。」<sup>8</sup> 在〈老柏與野薔薇〉中，老柏稱讚野薔薇：「你與他們（胭脂花、雞冠花）的不同，正如水晶與玻璃球不同一樣，你有的是天才和美麗，雖然你的生命那麼短，他們的生命是委瑣庸弱，不能打動人的心情，不能啟發人的思慮，他們生也糊塗，死也糊塗，他們哪能和你比。」<sup>9</sup> 陳衡哲擅長用兩種生命的對話，或老與少、或愚與明，來傳達一種努力改革現狀與自主奉獻的人生價值，這種價值當她赴美留學時，原本知識追求與人生開拓的理想，在與外國同學接觸後，有了更具體的目標，在〈一日〉中，外國同學好奇的向中國留學生打聽的是：「中國人喜歡吃死老鼠，可是真的嗎？」「中國的房子是怎樣的？也有桌子嗎？我聽見人說中國人吃飯、睡覺、讀書、寫

---

山書社，1994），頁 39-41。

<sup>7</sup> 陳衡哲，〈附錄二：我幼時求學的經過—紀念我的舅父莊思誠先生〉，《西洋史》，頁 399-408。

<sup>8</sup> 陳衡哲，〈運河和揚子江〉，收入《小雨點》，頁 68-69。

<sup>9</sup> 陳衡哲，〈老柏與野薔薇〉，收入《小雨點》，頁 95。

字，是都在地上的，正確嗎？」<sup>10</sup>陳衡哲設計中國留學生面對外國同學鄙夷質問的故事情節，應該是民初中國留學生的共同國仇傷痛，面對這種傷痛，她選擇不做一個清高的學者，而是個下凡的改革者，在〈西風〉中，她設計一個月亮的角色，來向西風敘述她的心情：「我正是因為下面的世界太惡濁了，住在那裡的人們，只有下降的機會，沒有上升的希望，所以我寧願犧牲了紅楓谷裡的快樂，常常下去看看他們，想利用我這一點愛力，去洗滌洗滌他們的心胸，並且去陪伴陪伴那比較高尚一點的人們的孤寂，我一點悲天憫人的苦心，別人不知道也就罷了，你如何也不知道啊。」<sup>11</sup>就是這點愛力與悲天憫人的苦心，陳衡哲在民初知識界常扮演著批判者與啟蒙者的角色，所以她的《西洋史》高中教科書自然應是有心之作了。

所以，筆者試想：重造命與惜情緣的陳衡哲，知道一甲子後，在台灣有一位跟她一樣教授西洋史的同道，對她這本具有開創性的教科書多所引薦，且他不僅自己也著作高中西洋史教科書，又提倡應建立台灣主體性的世界史觀，而他本人更是制定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程綱要的主任委員，所制定的 95 歷史課綱，內容不僅改變長期以來以中國史為脈絡的國史論述體系，其所開創台灣史獨立一冊的課程設計，仍持續影響著往後 98 與 99 歷史課綱，所以跟陳衡哲一樣在高中歷史教科書史上有著開創性的地位，相信陳衡哲一定會對他同樣充滿興趣。於是，筆者遂試想若陳衡哲身於現代台灣，目睹常常引介她著作的周樑楷教授所規劃的 95 課綱，其將會如何評論？重情易感的她，感念周教授多次的

<sup>10</sup> 陳衡哲，〈一日〉，收入《小雨點》，頁 20-21。

<sup>11</sup> 陳衡哲，〈西風〉，收入《小雨點》，頁 54。

引薦，會想要發表何種意見？另外身為知識份子的她，對突顯台灣複雜政治環境與國際情勢，且爭議性甚大的 95 課綱，定也會有所評論，於是筆者嘗試在本文最末部分，模仿陳衡哲在文學作品表達中，最慣用的對話概念，大膽地製造這場跨越一甲子的學術對話。為讓這場虛擬的對話能更逼真生動，筆者先從介紹陳衡哲及其著作內涵來開始討論。

## 二、歷史課綱與新史學浪潮下的典範

清末民初的歷史教科書，依據課程綱要的修定約可分為三階段：光緒 28 年至宣統三年為第一階段，民國元年至民國 10 年為第二階段，民國 11 年至民國 26 年為第三階段，<sup>12</sup>而陳衡哲 1924 與 1926 年所出版的《西洋史》應屬於第三階段。這三大階段有著一脈相承的課綱精神：「先講中國，次講亞洲，次講歐洲美洲史，宜就歐美諸國講其古今歷史中之重要事宜（上古不必多講）；詳於大國而略於小國，詳於近代而略於遠年；五十年以內之事，尤宜加詳，說近世事者十之九，說古事者十之一。」<sup>13</sup>強調詳今略古的著作內容，與先中國、次亞洲、再歐美：先國族再近鄰，由近及遠之編寫順序，可謂是當時的共識。

陳衡哲所處的第三階段又稱作壬戌學制，當時學制改革出現由仿日、德轉向為仿美的變化，<sup>14</sup>其歷史課綱編寫宗旨亦隨之轉變，認為：文化起於人心與自然的環境及社會環境之互感，其動

---

<sup>12</sup> 林素瑜，〈清末民初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研究（1902-193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1。

<sup>13</sup> 張之洞等，〈學科分科教法〉，《中學堂章程》，收入《奏定學科章程》（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0），頁 357-359。

<sup>14</sup> 林素瑜，〈清末民初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研究（1902-1937）〉，頁 27。

力出於觀念之實踐與開展；世界文化史的資料可分為宗教、知識、經濟、社會與政治五大類，研究途徑有活動、狀況、關係與組織四種；應用重要潮流來統率史實；史象有因果可尋者，以因果關係說明之。切忌牽強附會，不可將兩偶然且同時並現的史實，誤認為因果。<sup>15</sup>

首先可注意的是：民初歷史教科書已注意到歷史並非史事的先後編排，非常重視因果關係的養成教育，像陳衡哲就公開表示她所寫的西洋史教科書「所注重的，一為說明各種史跡的背景，一為史跡的因果，及彼此的相互影響，以求培養讀者分析現代社會上各種現象的因果。」<sup>16</sup>另外課綱要求編書者應擴充教科書內容，跳脫傳統政治史寫法，重視社會、宗教等多方面的敘述，此乃受美國新史學學派的影響。

美國新史學學派認為史學不應僅是政治史，應多寫社會制度史的內容；<sup>17</sup>且反對傳統歷史的教訓功用論點，認為學歷史不是從中得到道德教誨與天道安慰，而是從歷史中了解自己和人群的問題，並將所得應用到現今世界上。<sup>18</sup>當時宣傳上述理念最有力者，應屬何炳松先生，何炳松不僅翻譯魯賓遜的《新史學》，更在報刊雜誌公開宣揚上述理念，<sup>19</sup>何炳松也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的重要編輯，其大力宣傳的新史學理念，自然也會影響同是為商務印書館寫書的陳衡哲；陳衡哲在其教科書的一開始就提到：「我們所要

<sup>15</sup> 林素瑜，〈清末民初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研究（1902-1937）〉，頁 34-35。

<sup>16</sup> 陳衡哲，〈例言〉，《西洋史》，頁 7。

<sup>17</sup> 詹姆斯·哈威·魯賓遜，齊思和譯，《新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年），頁 13。

<sup>18</sup> 詹姆斯·哈威·魯賓遜，齊思和譯，《新史學》，頁 15。

<sup>19</sup> 何炳松，〈歷史教授法〉，《教育雜誌》，17：2（上海，1925.2），頁 2。上引齊思和的譯作，即是根據何炳松的翻譯作品所修訂出版。

研究的，不是某某皇帝的家譜，也不是武人政客的行跡，乃是我們人類何以能從一個吃生肉的兩足動物，變為一個代表現代文明的人。」<sup>20</sup>所以陳衡哲的《西洋史》「既考慮宗教的因素，也顧及民族和地理的成分，還能從經濟學和藝術史的角度打量問題」，<sup>21</sup>如此著作自是符合新史學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歷史課綱強調「文化起於人心與自然的環境及社會環境之互感」的觀念，這種以人心來立論的看法，陳衡哲可謂是忠實且靈妙的奉行著者。

在著作《西洋史》同時，因受限於篇幅，她曾將文藝復興的相關篇章另作《文藝復興小史》一書出版，<sup>22</sup>並且說：「他（文藝復興）是一種心情的變遷，不似其它史蹟的能以行為著跡，所以敘述他也至為不易。」<sup>23</sup>又說：「中古教會的束縛，比如一個陣痛的泥殼是死的，而人類要求自由的心卻是活的，是能與時俱長的。所以文藝復興進程的一件大事，便是這個充滿生命之精神的打破教會思想專制的硬殼，這件事業猶之孵雞的破殼出世，所以文藝復興的最大成功，也就是人的發現，或曰人的復活。不但如此，人類的智識和情感的容量，是愈練愈大，愈練愈精的，所以，此時人類的智識和情感，不但能回復他們的自由，並且能更日益擴充，日益升高起來。」<sup>24</sup>陳衡哲用人心自從掙脫中古宗教思想束縛的硬殼後，人類的智識和情感越趨豐富與精純的過程，來描述文藝復興的歷史意義，正符合當時歷史課綱所要求的「文化起於人心與自然的環境及社會環境之互感」，其動力出於觀念之實

---

<sup>20</sup> 陳衡哲，〈導言〉，《西洋史》，頁 3。

<sup>21</sup> 孫郁〈推薦序〉，收入陳衡哲，《西洋史》，頁 2。

<sup>22</sup> 陳衡哲，〈序〉，《文藝復興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頁 1。

<sup>23</sup> 陳衡哲，《文藝復興小史》，頁 9。

<sup>24</sup> 陳衡哲，《文藝復興小史》，頁 55-56。

踐與開展。」

面對課綱這種強調人心與環境互動，和觀念帶領行動的唯心要求，陳衡哲透過文學的筆法也巧妙地達到了。像她在描述亞歷山大的英年早逝，有著以下唯心詩意的敘述：「後來這個要做神的亞歷山大，終於戰勝了那個要做人的亞歷山大，於是因為反對他這個行為的緣故，有許多他的朋友和功臣都受了死刑，但他自己的心也受了死刑了，紀元 323 年，他自印度回到巴比倫，方欲轉帆西向，去征伐地中海的西岸，不意暴病忽發，年才 33 歲，竟自死了。」<sup>25</sup>陳衡哲認為因為亞歷山大的心死了，所以身也倉促地死了。

但陳衡哲卻不是個專斷的唯心論者，在她與胡適的互往書信中，她曾反對當時梁啟超所提倡的「自由意志的歷史觀」，<sup>26</sup>且認為她的《西洋史》教科書，有著唯物史觀的色彩，她「承認唯物史觀為解釋歷史的良好工具之一，但不是她的唯一工具」。<sup>27</sup>所以面對課綱的要求，為要跳脫唯心的束縛，但又有著唯心的色彩，陳衡哲用感性的文筆，讓社會制度有著唯心的妝扮，像她在描寫西歐因為社會風氣的騷動與不確定性，所以會發動十字軍東征，「因為十二、三世紀的歐洲，在他的地面上，滿浮著無限無際劇烈的感情，他飄蕩著，彷彿著，想找幾個具體的事物，來憑附這個游散的氣體。」<sup>28</sup>在描寫十字軍東征對西歐社會的影響時，她說「十字軍乃是混濁歐洲的一個清潔劑，走去了盜賊乞丐，歐洲的社會就漸有恢復秩序的希望，走去了諸侯武士，歐洲的封建制

---

<sup>25</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73。

<sup>26</sup> 陳衡哲，〈陳衡哲信〉，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 36 冊，頁 128。

<sup>27</sup> 陳衡哲，〈陳衡哲信〉，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 36 冊，頁 134。

<sup>28</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162。

度，也就失掉了她的靈魂，毒質腐料既去，社會上的康健，自然就有回復的希望了。」明明是要說明封建制度的崩潰，陳衡哲卻說是封建制度失掉了靈魂；她用感性的文筆與唯心的字句，來描述戰爭後的人口流動，所導致社會現象的轉變，如此，社會宛如一有生命的有機體一般，如同人心面對環境的諸多變化，而會有所感應與反應一樣，整個社會體遂有著唯心的樣貌，所以，造成社會改變之精神觀念外的諸多因素，都可以成為歷史唯心化解釋中的一部份，結果自然是跳脫唯心論的束縛，但卻有著唯心的色彩。

當時新史學思潮認為歷史的功用並非僅是道德教訓，而是藉由過去歷史以明瞭現在人的處境，這可謂是當時歷史創作者的共識。像呂思勉於民國 29 年出版的中國史教科書《呂著中國通史》，就說歷史的功用是：「（一）搜求既往的事實，（二）加以解釋，（三）用以說明現社會，（四）因而推測未來，而指示我們已進行的途徑。」<sup>29</sup>而在中國 1930 年代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史論戰，也是想從過去歷史中找到現在問題的解決對象與途徑。<sup>30</sup>像陳衡哲在《西洋史》的序文中，就提到她希望這本書「能幫助青年們，去發達他們的國際觀念，俾人類誤解的機會可以減少，人類的諒解和同情，也可以日增一日。」<sup>31</sup>而這種新史學的古為今用看法，容易讓歷史著作深受時代關心與社會思潮影響，此自是了解陳衡哲著作《西洋史》內涵的重要關鍵。

---

<sup>29</sup> 呂思勉，〈緒論〉，《呂著中國通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8），頁 2。

<sup>30</sup> 可參見：莊德仁，〈從「西周井田制度」的討論看當代古史觀念的轉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 70-75。

<sup>31</sup> 陳衡哲，〈原序〉，《西洋史》，頁 5。

### 三、反對戰爭與反歐洲中心論的訴求

「反戰」是陳衡哲著作《西洋史》的主要動機，她曾明言：「我的編輯《西洋史》，有兩個動機，其一，是近年來讀史的結果，深悟到戰爭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同時，我又信戰爭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避免的方法雖不只一端，然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們愚弄人民的黑幕，卻是重要方法中的一個，運用這個方法的工具，當以歷史為最有功效了。」<sup>32</sup>陳衡哲在 1921 年辭去北京大學教職，專心著作《西洋史》，一直到 1926 年《西洋史》下冊的完成，其間中國正處於軍閥內戰的國家分裂階段，她身為一位現代知識份子，又以教育啟蒙者自任，其《西洋史》「前者作於內戰的四川，後者作於齊盧戰爭時的南京」，<sup>33</sup>尤其在著作《西洋史》下冊時，正好居住在戰區南京裡，目睹同胞好友因避戰流離遷居的窘境，<sup>34</sup>自然對於歷史上此種反文明的戰爭行為，深惡痛絕。

陳衡哲當然知道當時中國的內戰局勢，背後有著西方帝國主義的利益糾紛，但孵育西方帝國主義的西方文明，同時也是民初中國士人宣揚民主與科學的文化源頭，為何西方文明會同時發展出民主、科學與侵略戰爭？文明與反文明如何並存共生？這些想必都會困擾著陳衡哲與當時的中國知識青年，這也是她著作《西洋史》教科書所意圖理解與解答的問題。

她曾言：「近代的科學，直接的既已成為一切學問的基礎，一切進步及人類謀求幸福的工具，間接的又靠了工業革命的勢

---

<sup>32</sup> 搶救民間家書項目組委員會，《任鴻雋陳衡哲家書》，頁 223。

<sup>33</sup> 陳衡哲，〈六版序〉，《西洋史》，頁 1。

<sup>34</sup> 搶救民間家書項目組委員會，《任鴻雋陳衡哲家書》，頁 83。

力，成為工業、商務，以及政治、社會，一切事業的原動力，她實是近代文明的中心點，不但如此，她又能不問宗教、不問民族、不問語言，不問天然或地理的限制，但知以真理賜予全世界的人類，所以科學又是一個可貴的國際勢力。但如此巨大的一個勢力，又豈能無弊呢？物競天擇說的流為弱肉強食是一例，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又是一例；而因科學發達之故，物質文明的勢力，尤能霸佔近代西方的文化，物質文明固自有他的貢獻，但種種殘酷不幸的情勢，如最近的戰爭方法及他的慘絕人寰的結果，卻也未嘗不是物質文明所貽的禍害。由此可知，一個工具的本身，實沒有善惡的可言，免去惡果，而得善果的權力，卻是完全操在運用這個工具的心情、腦力、及手腕之內的。」<sup>35</sup>陳衡哲清楚地交代西方帝國主義的形成背景，與科學萬能主義現象的惡果，但重要的是：科學僅是個工具，重要是操作者的用心；在這唯心的意見後面，可看到陳衡哲不同時人熱情擁抱科學萬能主義的覺醒。

陳衡哲從理解西洋歷史發展，她更發現：文明與反文明彼此有著正反辯證的微妙關係。首先她提出：兩河流域的上古史，與後來日耳曼人的入寇羅馬，阿拉伯人的北犯歐洲，都是遊牧族群侵略農業族群的鬥爭結果，<sup>36</sup>此種野蠻民族入侵文明民族，再滋生出新文明民族的過程，也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常態，<sup>37</sup>但不可因此就認為戰爭是文明發展必然的結果。她說：「武力是帝國的重要份子，所以帝國的成立，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他的結果，卻常常

---

<sup>35</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371-372。

<sup>36</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17、30。

<sup>37</sup> 陳衡哲為解釋這過程，曾以圖表來說明，這也是她此書的特色之一。陳衡哲，《西洋史》，頁 34。

能得到些意外的進步。我們需要明白，原動力和意外的結果—又名副產品的關係，完全是偶然的，歷史上有許多進步，許多文化事業是萬惡原動力的意外結果，帝國主義便是一例。」<sup>38</sup>帝國主義是人類文明意外的結果，即使他終造成某種程度的文明進步，也是種反文化且不可取的行為。也因為人類歷史是文明與反文明交錯發展的歷程，陳衡哲的西洋歷史資料取材，就非單純的以正面文明為主，因為反文明亦會促進歷史發展。所以「當把文化作為歷史的骨髓，凡是助進文化，或是妨害文化的重大事跡和勢力，都有歷史的價值，這是這本歷史取材的標準。」<sup>39</sup>因為她認為「凡是助進文化，或是妨害文化的重大事跡和勢力，都有歷史的價值。」<sup>40</sup>陳衡哲所理解的「文化」，應接近於「文明」，但歷史不是人類正面文明的一元論敘述；由此可知，陳衡哲的《西洋史》有著對西方歷史正負多面的辯證討論敘述，其水準當然超越僅溢美與只批判的歷史著作。

陳衡哲的《西洋史》其敘事策略，既非直線式因果關係陳述，也非政治、經濟、社會諸多因素的條列交代，其內容有著正反辯證發展的趣味。像她在討論法王路易十六的地位，如何由三階級所共同擁戴對象，轉變為斷頭台的冤死鬼，她就以圖示表明：路易十六的地位與平民發動第二次革命恰有著互為反比例的現象<sup>41</sup>；在討論自拿破崙崛起到梅特涅下臺，歐洲由 1799 年至

---

<sup>38</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26。

<sup>39</sup> 陳衡哲，〈導言〉，《西洋史》，頁 5。

<sup>40</sup> 陳衡哲認為她這個觀點，與胡適強調「纏小腳也是文化」的觀點不同，因為她認為：纏小腳是歷史不是文化。陳衡哲，〈陳衡哲信〉，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 36 冊，頁 128。

<sup>41</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317。

1848 年的政治情勢發展，陳衡哲亦是用圖示來展現此時革命與反革命二者互為消長的局勢變化；<sup>42</sup>在陳衡哲最引為自豪有所創見的中古史部分，<sup>43</sup>她認為：基督教教皇所領導的教會組織，是讓蠻族入侵的歐洲社會趨於穩定的重大力量，<sup>44</sup>另外蠻族建國所遭逢的內憂與外患，卻又激發封建制度的出現，但有趣的是：封建制度是歐洲分力的展現，而不是分裂歐洲的原因，因為封建制度的階級關係是歐洲社會穩定力量的來源，<sup>45</sup>所以教皇制度與封建制度可視作中古歐洲的兩大中心，但前者為合力，後者為分力，在這兩大勢力對立之下，出現的結果是列國的興起，而列國的興起既是對封建制度的統合，又是對教皇統一勢力的分化所出現的新結果，<sup>46</sup>所以列國的成立，乃是中古歐洲政治的一大進步，她撕開教皇制度下歐洲統一的假象，又掃除封建所造成分裂的亂象，但這個新結果卻未能使中古的統一能名副其實，反而是造成往後歐洲混亂分裂的開始。<sup>47</sup>陳衡哲運用正、反、合三者的辯證關係，統整地分析中古歐洲社會的發展與其對未來的影響，在這論述過程，陳衡哲不禁意表達出：統一是安定社會穩定力量的觀點；她甚至希望「他日全世界的人類，如能造成一個共同的歷史，如能發生一個共同的信仰，那麼，全球不啻成為一個國家。」<sup>48</sup>透過對彼此歷史

---

<sup>42</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329。

<sup>43</sup> 陳衡哲曾經跟胡適通信，認為《西洋史》此書為匆促成書，又因是初次著書，故缺點甚多，僅有中古史一段，有其獨到見解。陳衡哲，〈陳衡哲信〉，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 36 冊，頁 121。

<sup>44</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136。

<sup>45</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135。

<sup>46</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157。

<sup>47</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209。

<sup>48</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211。

的理解與交融，而達到人類社會的互信互諒與停止戰爭的效果，是陳衡哲著作的衷心期盼。

筆者在此想再討論陳衡哲著作教科書的第二個動機：「是我三年前在北京大學教授《西洋史》所得到的，我是最反對注入式教育的一個人，在史學界中，這個方法尤為無益有害，所以我曾特別注意學生的自己搜求材料，作為輔助或是證明我的演講之用。但這個努力的結果，不過使我感到中文參考書籍的缺乏，於是我便決議辭去教職，專門編書。」<sup>49</sup>首先我們需先了解民初中國中學與高等教育的教育狀況，當時圖書館藏書內容乏善可陳，普遍缺少讓學生能深入理解歷史發展的參考資料，<sup>50</sup>所以教科書就是學生與教師最主要理解過去歷史的參考資料，也因如此，民國 11 年壬戌學制所公佈的《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綱要》，就鼓勵教師應「用兩種以上的教科書，為研究之根基。」<sup>51</sup>再加上當時中學教員素質不一，<sup>52</sup>教科書僅注意符合教材大綱，而對於歷史課程的目標，多所忽略。<sup>53</sup>所以，編寫教科書是提升整體中國青年智識水平與教育素質的基礎工作，這也是讓陳衡哲辭去教職，以專心著作教科書的主因。<sup>54</sup>另外，陳衡哲的體弱多病，<sup>55</sup>與在惡質教育環境下，北京大學學生表現出對求學的怠惰，缺乏求知的熱情，更是

<sup>49</sup> 陳衡哲，〈原序〉，《西洋史》，頁 3-4。

<sup>50</sup> 陳衡哲，〈陳衡哲信〉，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 36 冊，頁 191。

<sup>51</sup> 林素瑜，〈清末民初的中學教科書研究（1902-1937）〉，頁 35。

<sup>52</sup> 鄭鶴聲，《中學歷史教學法》（南京：正中書局，1936），頁 29。

<sup>53</sup> 鄭鶴聲，《中學歷史教學法》，頁 32。

<sup>54</sup> 這種知識份子以知識報國為榮，積極從事救國啟蒙，且放棄大學教職的現象，並非偶例，像同樣為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寫高中西洋史教科書的何炳松，也是如此。

<sup>55</sup> 陳衡哲，〈陳衡哲信〉，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 36 冊，頁 36。

讓她願意退居幕後從事加強基礎知識工作，用辭職來喚醒學生的重要因素。<sup>56</sup>由此可知，陳衡哲編寫《西洋史》教科書，非僅為糊口牟利，更有著知識啟蒙與救國的抱負。也因為陳衡哲相信透過歷史理解是「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之最有效工具，再加上她觀察西方的歷史發展，有著正反辯證的眼光，及為當前中國謀出路的盼望，她所編寫的《西洋史》教科書，自然不同一般西方文化史著作，其作品亦聰慧巧妙地展現出反對歐洲中心論的史觀。

首先從其西洋歷史分期談起：「如 476 年西羅馬帝國的政變，可以作為歐洲上古和中古的界線；而第十四世紀初年歐洲又產生了許多表示中古末日的史跡，所以本書中古和近古的界線，便是 1321 年，義大利詩人但丁死的那一年。」<sup>57</sup>陳衡哲以但丁的死作為中古與近世的分界點，此點一方面是文藝復興的開始，又是列國制度興起的關鍵，文藝復興可謂是歐洲文明的再生與復活，也是讓近代歐洲科學發達與國勢興盛的重要根源，但列國的興起卻是導致歐洲內部混亂分裂且依其擴張慾望與船堅炮利優勢、向外侵略的重要起始點，再加上以蠻族入侵羅馬帝國作為歐洲上古時期的結束，此流露出陳衡哲對西洋歷史發展以戰爭作為斷限的看法，這種看法充滿著對戰爭的厭棄，與有著西洋歷史充斥戰爭的潛意識，自然對西洋歷史的發展充滿著悲觀。如同她在結論中所提到「因為列國政府中，像這個親王的人太少了，像俾斯麥及路易拿破崙一類的人太多了，所以國際和平運動的前

---

<sup>56</sup> 陳衡哲想辭去北京大學教職，但恐此舉會讓好友胡適為難，故曾多次向胡適說明其內心的想法，且胡適認為陳衡哲此舉，太過草率，應是受她性急個格影響。陳衡哲，〈陳衡哲信〉，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 36 冊，頁 20-27。

<sup>57</sup> 陳衡哲，〈導言〉，《西洋史》，頁 6。

途，與戰爭的前途相較，仍不免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感，我們研究西洋歷史的人，對於這個情形，應該發生什麼感慨，什麼努力的決心呢？」<sup>58</sup>

有趣的是：對西洋歷史悲觀，但卻對中國未來充滿希望。在討論新帝國主義時，她說到：「地球的面皮有限，而列強的欲望無窮。……在這個情形之下，亞洲的人民卻只有三條道路可走，其一是效法列強的武備以自救；其二是因不肯效法而淪為列強的奴隸；其三是憑著自己的天才，另去創造一個新道路。第一類的代表是日本，第二類的代表是印度，而徬徨於這兩條歧路之間，而又未能另自創出一條新道路者，則有我們的中國。」<sup>59</sup>這種貶抑西方卻又提升東方的例子，最有趣的是描述上古人類的起源。因為陳衡哲的著作年代恰是北京人考古發現之時，在當時甚囂塵上的西來說浪潮下，陳衡哲提出東來說的看法：「有許多人相信北部亞洲是人類發源地，而 1921 年，所謂北京人的牙齒在周口店的發現，尤足以助這個學說的成立，據地質學家和人類學者的考據，這個北京人生活的年代，當在五十萬至一百萬年以前。」又說「地球上初有人猿約一千萬年，確知地球上有人類的存在，約五萬年」<sup>60</sup>此不就說明北京人是人類的始祖嗎。

這種東方優於西方的觀點尚有：「歐洲一萬年至五千年以前的情形，那時的歐洲人，還不知道用金屬，還不知道用文字，還不曾見過有帆的船隻，這些都是後來亞洲和非洲送給歐洲的禮物。」<sup>61</sup>也就是說：歐洲文明是源於亞、非兩洲；陳衡哲在解釋西

---

<sup>58</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391。

<sup>59</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384。

<sup>60</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12-13。

<sup>61</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18。

洋上古史，有以下有趣的見解，她先說「兩河流域的歷史，本來是土著和游牧人民的戰爭史。」<sup>62</sup>從蘇美人佔據兩河流域下游起，就不斷遭受游牧閃米特族的攻擊，閃米特族也多次成為影響兩河流域的要角，所以「綜觀兩河流域及其西鄰的歷史，可以知道他實是一部閃米特族的歷史。」<sup>63</sup>然「波斯之興，實是印歐族出場的第一出，也是他們與閃米特族長期爭鬥的開始。印歐族是印度歐羅巴族的縮寫，因為他們不但是歐洲人的祖宗，並且也是那征服北印度的白種人。」<sup>64</sup>由於陳衡哲認為閃米特族與印歐族是白種中的兩個最重要、最先進的分族。<sup>65</sup>那之後的波斯與希臘的戰爭，就不可以解釋為民主的西方打敗專制的東方，而是印歐族彼此勢力糾紛下的衝突了。

陳衡哲認為上古希臘文化是西洋文明的高峰，但他的來源卻也是來自東方。「愛奧尼亞是希臘在小亞細亞的殖民地，他所受的埃及和巴比倫影響是很大的，他是希臘科學和哲學的老家，……這是東方文化影響希臘文化的一個好證據。」<sup>66</sup>這種東來說當然可視作對民初西來說的模仿與反動，但陳衡哲有時表現的太過火了，「紀元前第 5 世紀的希臘文化，忽然如此大盛，雖然由於希臘人的天才勃興，而東方文化所給予的影響，一定也是不少，比如這一時期希臘的科學家，都是世界科學史上的第一等人物，但或者他們的學說不盡是創造的，再說過份些，或者他們的

---

<sup>62</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30。

<sup>63</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42。

<sup>64</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44。

<sup>65</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32。

<sup>66</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67。

學說，都是從埃及和巴比倫的科學家抄襲得來的。」<sup>67</sup>上述觀點提到西方文明是抄襲東方，這似乎真的有點太過分了，但讀者不可僅認為此是清末西學源於中國說的復興，因為用科學方法所發掘出的北京人，在當時學術理解上，可視作人類的重要起源，再加上兩河流域與上古埃及文明都深刻地影響後來的歐洲文化發展，這種看法在清末民初民族自尊心喪失，要求廣泛西化的社會思潮下，陳衡哲的東來說意見發表是須有相當勇氣的。

陳衡哲又以為古希臘是西洋文明的源頭，而古希臘又多受東方文明的影響，那之後「羅馬乃是亞歷山大以後希臘文化的承受人，所以也是東方文化的承受人。」<sup>68</sup>由此類推，整個西方文化自多是源自東方文明了。<sup>69</sup>從上述陳衡哲論述東來說的內容，由現在學術眼光觀察，自然是略顯粗糙，但其也是當時學術背景的反映，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運用種族分類與文化傳播論的分析策略，此兩者是十九世紀以來民族主義興盛與達爾文進化論流行下的產物，原本西方學者因仰韶和甘肅彩陶的發現，就以此觀點來虛構中國文明來自西方，沒想到，民初北京人的考古發現，倒給了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機會。

在論述十字軍東征對西方的影響，陳衡哲認為；因為當時歐洲許多不穩定的力量，都因十字軍東征而被吸引至東方冒險，所以十字軍是歐洲的清潔劑；<sup>70</sup>她又說：「適在那個時期，成吉思汗起於蒙古，把亞洲的大部分，和歐洲的東部，統一在一個主權之

---

<sup>67</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78。

<sup>68</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83。

<sup>69</sup> 陳衡哲對上古西洋文明發展，有著由東自西的結論。陳衡哲，《西洋史》，頁 52。

<sup>70</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167。

下，於是交通日益便利，而蒙古人又樂與歐人交好，於是歐洲人之東行者日盛，教皇亦遣使，及傳教士到大汗的帝國來了。」<sup>71</sup>首先陳衡哲將歐洲人所謂的「黃禍」，美化為世界和平維持者與好客者，也在此時中國印刷術的科技西傳，更帶動西方文明的進步，所以陳衡哲認為十字軍東征後所造成歐洲商業的復興與中產階級的興起，甚至於文藝復興，都應歸功於東方蒙古的穩定世界秩序功勞；而由十三世紀的世界史眼光，當時東、西方正好是和平與混亂的對比，此也可看出同樣有機會成為世界強權，然歷史上東方的中國，在他強盛時，並不是侵略世界與發動戰爭的魔王，而是世界和平的締造者。

#### 四、女性意識與驅魔情結的特色

陳衡哲《西洋史》中，一直到目前仍是非常具有特色，且最常為人所稱道的，就是她用女性意識來創作歷史，她常常在說明充斥男性與戰爭的古代歷史敘述中，加入當時女性地位的發展與當時女性優異的表現。像她談到上古巴比倫帝國的發展，就說：「漢摩拉比可以算得上上古時的一個賢君」，除了他的種種政治作為外，她又附上「法典中的婦女地位很高」，最後結論是：這個法典「是漢摩拉比的一件不朽大業。」<sup>72</sup>在說到愛琴文明時，陳衡哲關心的是此文明在女性時尚衣著上的成就，「現在若有人穿了這四千年前克里特婦女的衣服，走到巴黎或是紐約的街上去，一定有人要稱讚她們的時髦的。」<sup>73</sup>

---

<sup>71</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166。

<sup>72</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33。

<sup>73</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50。

陳衡哲也藉由西洋歷史，來介紹她所信仰的女性意識，在稱頌文藝復興時期出現女性自覺與女學者的同時，她說：「這些女學者是近代女子解放的先鋒，尤可貴的，是她們的解放方法，她們的解放是由內而外，是以解放自己的理智為起點的，她們並不會以解放的責任，推到男人的身上去。」<sup>74</sup>陳衡哲並不認為女性應去爭取男性所擁有的一切權力為滿足，像她在談到工業革命所造成女工出現，與女性意識抬頭的現象時，就認為「人們常有把女性參政活動，視為婦女運動的唯一事業者，這是一個大錯誤。女子參政固是婦女運動中的一件事，但她絕不足以代表婦女運動的全部。」<sup>75</sup>她認為「婦女們如欲與男子們爭到真正的平等，根本上尚以自己智識的解放，能力的修養，及人格的提高為最重要。」<sup>76</sup>所以陳衡哲建議婦女運動者，應「去幫助我們的青年姐妹們，使她們能發揮她們各人的天才，於最適當的途徑。」<sup>77</sup>陳衡哲清楚地表達女性意識的抬頭，不是在於權力的獲得，而是女性本身智識、能力與人格的提升，這些在現在都是非常具有建設性的意見，竟早已出現在民國初年中國著名女學者的著作中，尤其是五四運動後，中國女性意識的抬頭浪潮下，婦女們一方面努力走出家庭，爭取自身權利，另一面卻競相爭逐學習摩登事務，甚至出現甘願因為拜金，而沉淪於當軍閥、富商姨太太的不恥事件，<sup>78</sup>由此理解上述陳衡哲的意見，更有著振聾啟聵的社會教育意義。

---

<sup>74</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191。

<sup>75</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387。

<sup>76</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387。

<sup>77</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387。

<sup>78</sup> 陳衡哲曾公開批評這股社會腐敗風氣，見：搶救民間家書項目組委員會，《任鴻雋陳衡哲家書》，頁 243。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陳衡哲的女性意識背後，有著對理想家庭生活的願景在，她曾在一次公開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文化價值的學術會議上，提到：「中國家庭就是一部機器，一個系統，個體成員只是這部機器中的螺絲釘，她們不是為了自己而活，而是為了整個機器而存在。」<sup>79</sup>在批判傳統中國家庭之際，陳衡哲在另外的場合，卻表達她對家庭中婦女角色的傳統期待：「若使每個女子，都能做一個徹底的賢母，那麼，世界上還有什麼別的問題呢？」<sup>80</sup>陳衡哲曾公開地感嘆她的好友胡適先生，因為太太好打麻將，不擅打理家務，以致子女教育不佳，且她還半打趣的認為，若胡適有位好太太，她就不用分心去照顧家務，可以專心學術研究，其學術成就當是更高。像陳衡哲本身就是此理論的奉行者，她在著作《西洋史》時，亦不忘自己賢妻良母的角色，仍一面照顧子女成長發展。她認為改變中國家庭的專制機器結構問題，與其說是革命性的破壞，或是婦女起而爭取與男性同樣的權利，倒不如是：透過婦女本身智識、能力和人格的成長，與家務的用心經營，來改變傳統的惡質家庭文化。

此就如同她談到中國文化在與西方文化接觸後，「他（中國文化）逐漸意識到，其自我保存的最高使命，取決於他是否願意從外來文化中，選取那些有助於幫助他解決自己所面對諸多問題的武器，以及在此過程中，表現出的努力。」<sup>81</sup>由此可知，陳衡哲面對西方文化，是選擇性學習適合中國自己的文化發展，而非全

---

<sup>79</sup> 陳衡哲，〈結論〉，收入陳衡哲主編《中國文化論集：1930 年代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與想像》（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頁 259。

<sup>80</sup> 陳衡哲，〈洛綺思的問題〉，收入《小雨點》，頁 78。

<sup>81</sup> 陳衡哲，〈結論〉，收入陳衡哲主編《中國文化論集：1930 年代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與想像》，頁 254。

盤的接受。陳衡哲曾語重心長地認為既然現代中國無法逃避西方文化，且難以離開西方文化的影響，那就應思考中國面對西方文明的應有態度：「所謂西方物質文明，只不過是當代歷史的產物，是文藝復興後期科學發現的結果，而文藝復興本身不過是對於中世紀歐洲文明中的來世觀的反動而已，就連文藝復興源頭的希臘文明，也與現代西方文明不同，因為當時的生活方式幾乎與工業革命前的歐洲完全相同，與今天的中國相差無幾。因此，說到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差異的界線，與其說是空間的，不如說是時間的。因此，中國真正需要的與其說是西化，不如說是使其人民現代化。」<sup>82</sup>陳衡哲透過對西洋歷史的理解，她認為當時中國的現況，正如同工業革命前的歐洲一般，所以非常樂觀的認為，東西文明的界線並非空間，而是時間，也就是說：中國也可以發展出跟現代西方文明一樣的高度水平；另外陳衡哲還提出她對西方文明的觀察，認為學習西方不應僅停留在物質文明，或是高談全盤西化，因為讓現代西方進步者，是從文藝復興以來的入世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創造出現代西方的生活方式，所以要讓中國現代化，除了提倡科學外，人民的智識、能力與人格的水平，都是重要的關鍵因素。

除上述女性意識之外，陳衡哲另一個有趣的書寫關懷：是她對西洋歷史上魔王的批判。根據筆者初步的統計，陳衡哲在《西洋史》一書中公開地批判歷史上的魔王現象，約高達 15 次之多，這種頻繁使用具有高度價值觀的魔王字眼次數，在中外歷史教科書書寫史上，應為罕見，此除是陳衡哲本身的慣用口頭禪之外，

---

<sup>82</sup> 陳衡哲，〈結論〉，收入陳衡哲主編《中國文化論集：1930 年代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與想像》，頁 254。

更可見，此字眼反映出她對西洋歷史發展的某一現象的厭惡，筆者姑且稱之為：驅魔情結。在當時民初知識份子所宣傳的訴求中，與陳衡哲批判魔王最接近者，當屬陳衡哲的好友胡適所提出的「打鬼」了，胡適的「打鬼」是想用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把以往中國故紙堆中的迷信與溢美加以清除，有著科學理性的訴求<sup>83</sup>，此與陳衡哲的驅魔，難道立場相同嗎？為釐清彼此關係，先從陳衡哲所塑造的魔王形象談起。

陳衡哲在介紹古波斯帝國的興起時，提到：「居魯士的兒子岡比西斯也是一個大魔王，在他的刀光之下，埃及也就失了他的自由。」<sup>84</sup>在提到上古希臘內戰後馬其頓的崛起：「馬其頓忽然出了一位魔王，叫做腓力，腓力的唯一目的，是以武力去擴張他的領土。……希臘人聽見這位魔王去世，正欲慶祝他們自由的恢復，卻不料又來了一位更大的魔王，此時腓力的兒子亞歷山大不過二十歲，但他的父親已經知道他的胃口，知道希臘全國也是不能饜足這位少年的欲望的。」<sup>85</sup>讀者應該可以很清楚地發現，陳衡哲所批判的魔王，是指發動戰爭的侵略者，就這層表面意義來論，這與上述胡適主要強調科學理性的訴求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陳衡哲對西洋歷史人物的魔王評價，似乎有著一些特殊的彈性，像她就稱讚古巴比倫帝國的漢摩拉比王，提到上古波斯帝國的締造者大流士就說：「大流士的威權雖專，而他的政策卻是偏於放任的，各省的政策，除了軍備和財政須得服從皇帝的命令之外，關於其他各事，都有相當的自由，大流士又建設海軍，疏通蘇伊士運河，修築道路，以利帝國的交通，若用現代的名詞，我

---

<sup>83</sup> 莊德仁，《從「西周井田制度」的討論看當代古史觀念的轉變》，頁 87-90。

<sup>84</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46。

<sup>85</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72。

們就可以說：大流士乃是一個模範的開明專制君主。」<sup>86</sup>在此我們發現陳衡哲的魔王標準，有所鬆動與彈性，都是上古波斯帝國的侵略者，大流士的評價為何明顯地高於居魯士與岡比西斯？

關於此點，須從民初 1920 至 1930 年代的中國政治局勢來分析，此時的中國在歷經樂觀地擁抱西方民主制度，且勇敢地推動幾次政黨政治實驗後，竟出現多次帝制的復辟與軍閥的割據，這些政治現象也讓許多知識份子不會再天真地認為可以把西方民主制度，完全搬到中國來加以實現，尤其面對當時中國的分裂與軍閥的混戰，許多知識份子覺得中國需要的是一個專權但開明的獨裁者，<sup>87</sup>這就是上述陳衡哲特別優待大流士的重要原因。然從陳衡哲寬待大流士的歷史評價中，我們看到陳衡哲對民初中國的時代關懷；她稱讚大流士，主要集中在他的福國利民建設與自由放任的政策，所以可以從寬看待他對外侵略的惡行。這種刻意的優待也出現在對上古希臘的雅典上。

首先她在描述上古希臘城邦在歷經黑暗時期之後，開始向外發展海外殖民事業時，就開始同情希臘了，「強凌弱，眾暴寡，是人類的一個普通弱性，希臘戰勝敵人之後，那些君主中的強的，城邦中的大的，也就漸漸征服或是併吞了他們鄰邦中弱的小的，做了那一方的盟主了。」<sup>88</sup>但在海外擴張的過程，許多城邦受到東方波斯帝國的威脅，於是「雅典是海外殖民地的大姐姐，現在見他們受欺于波斯，豈能袖手不管？」<sup>89</sup>於是影響西洋上古史重

---

<sup>86</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47。

<sup>87</sup> 關於民初學界民主或獨裁的討論，可見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1989），頁 59-152。

<sup>88</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55。

<sup>89</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57。

要的波希戰爭爆發了，雅典在領導希臘城邦佔勝波斯後，「那個歐洲歷史上破天荒的帝國，雅典帝國居然在希臘出現了。」<sup>90</sup>雅典向外掌控希臘城邦，竟引起其他城邦的不滿，其中「斯巴達他看見雅典的繁華強盛，不免又恨又妒。」<sup>91</sup>遂爆發希臘半島的內戰。在上述陳衡哲描述上古希臘城邦中雅典的崛起與向外擴張，十分清楚地流露出偏袒與同情，像雅典的壯大，甚至對外擴張，是因為人性的弱點，再者她用「大姐姐」來形容擴張時的雅典城邦，用女性的陰柔形象試圖沖淡雅典城邦擴張時的凶惡殘暴，且在雅典領導希臘城邦打敗波斯後，她用「竟然」來描述她對雅典終走向帝國道路的錯愕；更有趣的是：明明是雅典帝國干預其他城邦的發展，強占提洛同盟的金庫，引起希臘城邦的不滿而爆發的希臘城邦內戰，她認為忌妒、怨恨雅典成就的斯巴達，也須負相當的責任。

陳衡哲如此寬待雅典的原因，當然與上述驅魔情結有關，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當然是評價為魔王的重要參考要件，然更重要的是：對內壓制思想言論、打擊自由活動與實施專制統治，更是成為魔王的關鍵。陳衡哲因此批評中古基督教會在成為歐洲社會的思想主流，獲得穩定社會的大權後，卻壓抑新思想的發展，認為此舉就是「專制魔王」；<sup>92</sup>對於 1814 年維也納會議後，實施保守專制政策的梅特涅，也給予「專制魔王」稱號，<sup>93</sup>另外，對於專制但鼓勵新思想且作風開明者，如 18 世紀的歐洲開明專制君主，則

---

<sup>90</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61。

<sup>91</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62。

<sup>92</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154。

<sup>93</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347。

加以讚揚。<sup>94</sup>由此可知，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在陳衡哲的評價標準裡，並不是成為魔王的要項，壓抑自由與民主及實施專制，才是被批判為魔王的重要關鍵。陳衡哲型塑上述的魔王標準，當然有著她現實的關懷存在。

陳衡哲對上古希臘文明心嚮往之，曾云：「這一千年的希臘歷史，我們應該把它當作西方歷史的大轉樞看待，同時他又靠了西方，成為世界史的大轉樞。這個歷史有三件特殊的事情，是最當注意的，第一是他所收束的，第二是他所成功的，第三是他所開暢的。他所收束的，是太古時代的傳說和威權的專制；他所成功的，是世界上最美麗、最完備的文學和美術上的創造；他所開暢的，是近代科學的建設，和我們所生活的文化制度，這是人類權力超越天然的一個確定的步級。」<sup>95</sup>為何會有如此深度的喜愛，我們可從陳衡哲大力讚揚上古雅典領袖伯里克里斯的言論中，窺探端倪，陳衡哲說：「伯氏的政策是放任的，他對於古來的傳說是懷疑的，對於新思想是獎勵的，對於因思想獨立而受社會廢棄的人，是敢保護的，對於公共的建築和娛樂，是熱心提倡的。」<sup>96</sup>陳衡哲認為上古雅典城邦的黃金時期，是因為對新思想的寬容、提倡自由的風氣、推動公共建設與對迷信的質疑，這些項目，不就是中國民初知識份子所想要建構的理想國度嗎？在此我們看到「打鬼」與「驅魔」兩者共同支持科學理性的現象，也因為陳衡哲在描述西洋歷史發展時，看到她理想世界的再現，所以她在總結上古希臘文明的成就時，竟多了些私人情感的關懷，她說：「這個時期之中，傳說的神話和迷信常常與懷疑和求真理的態

---

<sup>94</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281。

<sup>95</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80。

<sup>96</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68。

度，立於對敵的地位，雖然靠了伯里克利的賢明的放任政策，靠了蘇格拉底一類哲士的犧牲，科學的精神，終於在舊勢力的迷霧中，為歐洲的文明打開了一條大路。但是當時希臘的一般人士，卻不曾見到這個，他們但覺得歧路徬徨，舊的信仰既已搖動，新的知識也是千歧百出，真不知是走哪一條路為是啊？」<sup>97</sup>陳衡哲看到上古希臘在鼓吹科學以消除迷信後，在清除過去思想的障礙後，竟出現不知何去何從的窘境。在此我們似乎也看到民初知識份子的身影，與陳衡哲交好的胡適提出「打鬼」訴求，以科學理信的態度，來清除故紙堆中的愚昧與迷信以進行整理國故工作，不恰與上述伯里克里斯時代的雅典知識風氣一樣嗎！但在大力擁抱西方科學與民主文明的同時，中西文化如何調適？如何選擇適合中國的西方文明？和進行文化融合後的中國新文明樣態為何？陳衡哲與當時中國有心的知識份子也有著「真不知是走哪一條路為是啊」的徬徨。

陳衡哲曾說明此項文化工程的艱難：「像我們從前那樣拒絕西方文化肯定是笨蛋，但是盲目地採用和模仿同樣也是傻瓜，在找到任何解決途徑之前，一定要考慮到人民的性情，其社會環境文化背景，其特別欲求等，這就是我所說的從變化中的文化混亂中，有意識地找出一個正確的方向，這也就是我所說的根據中國的根本需要，正確地選擇和採納西方的文化。」<sup>98</sup>陳衡哲的上述意見，是發表在一群中國新式知識份子受邀參加外國學術單位舉辦的認識中國文明學術會議上，此看法發表，恰好緊接在《西洋

---

<sup>97</sup> 陳衡哲，《西洋史》，頁 71。

<sup>98</sup> 上述意見是發表於《西洋史》出版之後，應可代表陳衡哲在著作教科書時，對中西文化的看法。陳衡哲，〈結論〉，收入陳衡哲主編《中國文化論集：1930 年代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與想像》，頁 261。

史》出版之後，所以所謂民初知識份子「找到任何解決途徑之前」，正可理解是如同上古希臘文明面臨歧路旁出現象一樣；而「找出中國未來正確的路」，也正反映出陳衡哲著作《西洋史》最重要的現實目的。

## 五、餘論：陳衡哲對 95 課綱的意見

95 歷史課綱的頒布，可溯源自民國 90 年，教育部開始研擬制定高中課程標準，於民國 92 年陸續公佈，其間曾有三次的修定，並引發相當的爭議與討論，最後於民國 94 年 1 月頒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95 歷史課綱的公佈，原為銜接九年一貫的課程，但媒體主要關心的是：課綱確立台灣高中歷史課程設計的順序是：先台灣史，再中國史與世界史，此種編排將台灣史教材獨立一冊，壓縮中國史教材為一冊，改變以往台灣史納入中國史體系的安排，並首次提出以歷史核心能力作為歷史教學的重要目標。

面對這種標榜以歷史學科核心能力作為教學目標的作法，陳衡哲應該是喜歡的，她在民國 6 年的文學作品〈一日〉中，曾以她的留美生活作為背景，描述中國留學生的所見所聞，其中談到美國歷史教授米兒博士，在課堂上曾以「以盧梭或孟德斯鳩或福祿特爾的口吻，評論法國第二次的憲法」為題目，來測驗同學，<sup>99</sup>這種測驗取徑即是符合 95 課綱中歷史核心能力的歷史理解；而在 95 課綱一開始的教育目標，第二點中提到：幫助學生理解自己文化的根源，建立自我認同感。若以此理由所以要先教授台灣歷史於土生土長的台灣青年，陳衡哲在情感上應該也是會接受的，原

---

<sup>99</sup> 陳衡哲，〈一日〉，收入陳衡哲，《小雨點》，頁 14。

籍湖南衡山的她，因從小在江蘇武進長大，故常自稱自己是武進人，<sup>100</sup>陳衡哲對 95 課綱強調台灣高中生居住地台灣歷史的重要性，心理上應傾向於同情的；再看到教科書中紙張的講究，豐富精美的圖表編排，與課後問題的設計等，她一定會對現今台灣精良的出版水準，印象深刻且多加讚揚。但愛好自由且提倡自主的陳衡哲，對於 95 課綱與當時政治局勢密切相關而多次修訂的內容，教科書著作者與審查委員不對等的關係，<sup>101</sup>以及彼此出現意見不同時，缺乏公平的仲裁機制；<sup>102</sup>同時課綱主張標榜多元，但對教科書的應編寫內容卻有著細節性的規定等，應都會讓陳衡哲感到不耐與憤怒。

而最讓陳衡哲難過的，應該是在 95 課綱陸續公佈時，其間引發的爭議與討論，無論是在公聽會上，不同立場民眾的叫囂與衝突，或是報刊媒體與民意代表，放大特定議題刻意激化的族群對立，尤其是 95 課綱竟引發台灣歷史學術界師徒、同事與朋友間多年感情的決裂，主要爭議多則集中在台灣史與中國史部份，作為具有強烈中國意識的陳衡哲，一定會對台灣史脫離中國史脈絡且獨立一冊，深感不滿，因為她發現 95 課綱制定小組之所以會先教授台灣史的原因，並非媒體所云「兩國論史觀」或是「屈從台灣意識」等政治觀點，而是從歷史教育觀點出發，其意見是：「台灣史正是高一學生最為熟悉的歷史知識，最容易引導學生藉由史

---

<sup>100</sup> 陳衡哲，〈本書作者〉，《小雨點》，頁 5。

<sup>101</sup> 羅若禮，〈糾結中誕生的歷史教科書——從九五課綱爭議談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44-50。

<sup>102</sup> 梁安琪，〈高中世界史教科書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2009.7），頁 145。

料證據、歷史理解與歷史解釋的討論，達到教學目標。」<sup>103</sup>聰慧的陳衡哲一定很快發現其中的問題：首先課綱委員們如何確信與得知台灣中學生的台灣史學習水準，比其中國史與世界史程度還要好？尤其當陳衡哲發現並非所有課綱委員皆支持此觀點時，她應該會對上述觀點深感不解，例如有課綱委員就認為「現在的台灣孩子知道白雪公主比文成公主多得多，知道亞瑟王比鄭成功還多」，<sup>104</sup>若以此看法，應該是以西洋史作為培養核心能力的首要教材才對吧。若以培養核心能力為理由，而將台灣史獨立成冊，且成為最先教授的教材，在這種標榜核心能力學習的教育理念下，95 課綱的教科書編寫與審查委員們，應都會努力地落實核心能力於教科書內容中，但檢視 95 課綱下的教科書編寫內容，亦與核心能力培育關係不大；<sup>105</sup>且核心能力的培養，應該是跨越地緣與國族界線，故基於培育核心能力而要先教台灣史，此種立論，證據不僅似乎略嫌不足，甚至有為同心圓理論護航之嫌。

陳衡哲作為一個西洋史研究者與教學者，一定會對 95 課綱中的西洋史部份多所關心，尤其是 95 課綱所提倡的多元世界史觀。作品常表達個人立場的陳衡哲，首先會對台灣中生代史學家敢於表達：歷史著作一定有著史家主觀意識形態，與「一個政權一定需要歷史來建檔」的說法，印象深刻，<sup>106</sup>上述意見正如課綱委員

---

<sup>103</sup> 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歷史」課程綱要》，2005，頁 38。轉引自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35/%E6%AD%B7%E5%8F%B2-%E5%BF%85%E4%BF%AE.pdf](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35/%E6%AD%B7%E5%8F%B2-%E5%BF%85%E4%BF%AE.pdf)。

<sup>104</sup> 周樑楷先生的意見，收入：金恒煒，〈從《認識臺灣》座談歷史教育〉，《當代》，2：120（臺北：1997.8），頁 63。

<sup>105</sup> 梁安琪，〈高中世界史教科書研究〉，頁 100。

<sup>106</sup> 此種看法，周樑楷、吳密察與李孝悌先生，都公開支持，見：金恒煒，〈從《認識臺灣》座談歷史教育〉，頁 55-57。

所說：「若要成為第一流的史學家或學者，並不怕有個人的立場，反而當心沒有個人的立場。所以，與其消極的逃避，不如積極的面對現實，選擇自己應有的角度。架構個人的一套世界史觀，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需要許多條件的配合，然而最重要的一項是，應該將自己成長的地方納入世界秩序裡，作一全盤性的思考，當現實的世界秩序越動盪，不確定的時候，談論世界史越應該不失個人的立場，因為這正是多種世界史觀競爭傾軋的時候。」<sup>107</sup>作為一位科學派史家，陳衡哲在看到 95 課綱後，與檢視自己的作品，一定會對自己在 70 年前《西洋史》教科書中所認為：「歷史不是叫我們哭的，也不是叫我們笑的，乃是要求我們明白它的」的天真看法，<sup>108</sup>深感汗顏，因而對 70 年後史學思潮的發展，與台灣言論自由的開放深表羨慕；但也不禁問到：既然歷史是有立場的，那什麼是 95 歷史課綱所要表達的世界史觀立場呢？

95 課綱的世界史部份，在 15 世紀以前偏重從世界文化遺產入手，15 世紀以後，除強調東西文化交流影響外。更要突顯多元文化的特色。<sup>109</sup>95 課綱的這種特殊安排，主要是想打破歐洲中心論與建立台灣主體觀點。因為課綱委員認為以往反歐洲中心論者，都會刻意強調亞洲人或中國人對世界的貢獻，這種以牙還牙的作法，只是以另一種意識形態來對付歐洲中心論而已。<sup>110</sup>面對上述

---

<sup>107</sup> 周樑楷，〈世界史觀和世界秩序的辯證關係〉，《當代》，78（臺北，1992.10），頁 82。

<sup>108</sup> 陳衡哲，〈導言〉，《西洋史》，頁 4。

<sup>109</sup> 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歷史」課程綱要》，頁 38。

<sup>110</sup> 周樑楷，〈多元文化中的人與世界：建立臺灣主體性的世界史觀〉，《當代》，110（臺北，1995.6），頁 113。

意見與批評，陳衡哲應該會一時語塞，性急直率的她，竟不自覺地挑起 95 課綱在世界史部份的毛病，直指 95 課綱對西方殖民侵略，似乎缺乏某種被殖民者應有的氣憤，例如在描述中南美洲古文明在歐洲海外冒險的地理大發現下慘遭滅絕命運時，95 課綱竟用「世界文明的交匯」作為標題；又如談到近代中國面臨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時，即「西潮衝擊下的滿清帝國時」，針對清末新疆回變與建省部分，竟出現「滿清政府積極轉向內陸，造成和北方、西北、及南方民族的互動和衝突」<sup>111</sup>的因果論敘，陳衡哲一定會對上述 95 課綱歷史因果關係的錯亂，感到不解，遂又對標榜核心能力的 95 課綱，是否真的落實核心能力教育感到懷疑。

陳衡哲發現 95 課綱所規範西元 15 世紀以後的世界史，仍是以歐洲發展與西方立場為主軸，<sup>112</sup>即使是以「強調從今日之台灣觀點看東亞，亞太及世界史上的重要問題」為目標的 95 課綱選修課程，所看到的中國文化教材充滿著：政治、巫術、娛樂特質；而下冊世界文化專題，首章則是談論第一次放入台灣歷史教科書的海外華僑，莫非 95 課綱的設計目的，是要台灣青年理解自己正是處於如同東南亞國家中的海外華人地位？

強調自主造命的陳衡哲，應會對 95 課綱委員們力圖建立台灣主體性的努力，深表同情；身為一位中國籍愛國史學家，陳衡哲對於 95 課綱委員所云的：「即使是統派，也是要有台灣的史觀，才叫統派」<sup>113</sup>的看法，一定非常有興趣，心中直覺地想到：95 課綱所呈現先台灣、再中國、後世界的編排，是較接近有台灣主體

<sup>111</sup> 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歷史」課程綱要》，頁 30-31。

<sup>112</sup> 梁安琪，〈高中世界史教科書研究〉，頁 73、131。

<sup>113</sup> 周楷楷先生的意見，收入金恒煒，〈從《認識臺灣》座談歷史教育〉，頁 63。

性的統派觀點？還是獨派立場？且陳衡哲定會再進一步追問：課綱如何呈現台灣主體性？先台灣、再中國、後世界的教授順序編排，是台灣主體性的具體呈現？還是如同課綱委員所擔憂的：此僅是依著地理空間，由近而遠，所呈現三條平行線的疑慮；<sup>114</sup>陳衡哲也一定會對課綱所標榜的多元世界史觀有所反省，95 課綱在 15 世紀以前，以古代文明的遺產與普世宗教這兩個課題，來呈現古代世界史的多元發展，此種跨越歐洲為中心的規模與兼具時序的設計，當然早已超越陳衡哲以歐洲為主的西洋史論述範圍，與呈現出將世界多種文明源頭加以並敘的創意，這種多元世界史觀的安排，亦出現在十五世紀以後的世界史教材；就在陳衡哲一方面讚嘆課綱設計者的用心之際，卻又發現這種依照時間、地區，但跨國度的歷史敘述，與重視非主流國家的發展介紹，容易出現歷史脈絡斷裂與片段的危險；尤其當 95 課綱重視多元文化的呈現，又試圖擺脫以往以歐美大國為主的論述體系，其刻意描述世界史上弱勢族群的發展，如：中南美洲古文明發展、19 世紀後期南半球在地文化的發展歷史等，當這些西洋史學界的冷門領域，尤其依照課綱規定，要具體文字化成一章或一節內容呈現時，就讓人對 95 課綱多元文化世界史觀的特殊安排，深感好奇，莫非此多元世界史觀，其努力要突顯的是：存在即是合理、小即是美的歷史看法，這些看法，難道都是針對台灣而來？

最後就讓我們檢視多元世界史觀下的台灣史課綱安排，第一章早期台灣：主要介紹原住民歷史與荷蘭和明鄭時期的歷史，課綱強調此段應描述台灣被納入世界體系的過程；第二章是清代的

---

<sup>114</sup> 周樑楷先生的意見，收入金恒煒，〈從《認識臺灣》座談歷史教育〉，頁 63。

長期統治，此段是台灣逐漸建立漢人為主體的過程；第三章日本統治時期：描述殖民政策與基礎建設的發展；第四章當代的台灣與世界，敘述國民政府如何由代表中國到被國際孤立、與經濟高度發展下，所帶動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從上述課綱所規範的台灣史章節標題，可看出是從地理上的台灣島角度，來肯定任何族群與政權的統治，似乎力求兼容並蓄與客觀平衡，但如此如何呈現所謂的：台灣人的主體立場？尤其在力求客觀平衡下，所呈現的台灣人立場，當然是不得罪任何過往與現在的政權統治，但卻又是毫無立場的虛無現象，那如此所呈現的台灣立場，很可能僅剩下地理空間上的居留地意義而已。

若從文化源頭的角度來看台灣史的課綱編排，課綱委員顯然有意在此呈現世界經濟體系與傳統漢文化的交融與競逐，這種文化源頭的多元呈現，恰似現在台灣人親中或親美的不同政治選擇，也就是呈現台灣正處在抉擇的階段。又如課綱委員在高二世界史下冊第 5 章我們生長的時代的第 2 節海峽兩岸與世界的新秩序中所云：「五百年來，近代世界逐漸形成一體。尤其，與日常生活相關的生態環境、經濟活動，使得全球每個角落都無法遺世孤立。高二歷史（第三冊）是以近代世界之形成為主軸。然而，所謂全球化，嚴格地講，不應與近代世界之形成等同，混而為一。全球化僅是「近代世界之形成」的最新現象。在近代世界之形成過程中，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之建立是一項重要事實。近兩百年，國家機制、國際組織及國際關係扮演歷史的要角，國家也成為歷史論述的基本單位。不過，近數十年來因為第三波資本經濟的快速成長和資訊交通的突飛猛進，跨國公司明顯挑戰國家的機能。全球化的現象，雖然不至於全盤去國家化，但是超越國

際邊界的思維和行為的確已經發生。<sup>115</sup>」我們若把上述課綱對當代世界的描述放入台灣目前處境來理解，則海峽兩岸簽署 ECFA 之後，上述的民族國家趨勢，若視作台灣自主獨立的聲音；全球化跨國經濟組織即如同 2008 年金融海嘯後，中國經濟霸權下兩岸的商業頻繁往來局勢，課綱委員莫非早已預知台灣未來前途發展，充滿著不確定性。

七十年前著作《西洋史》的陳衡哲，面對中西文化交融的新時局，有著歧路旁出的徬徨感；七十年後，95 歷史課綱所流露台灣人對自己政治地位與文化認同的不確定性，竟也有著如陳衡哲一樣，充滿著徬徨與不確定感受，此莫非也是歷史的造化弄人。

（責任編輯：林益德 校對：黃于庭、劉世珣）

---

<sup>115</sup>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歷史」課程綱要》，頁 37。